

常惺法師的佛法救國論

蘇州大學哲學系 研究生
高亮

摘 要

20 世紀初的中國，內外交困，思想界亦是眾家爭長，有識之士紛紛批判傳統的中學，引征西學，以西方科學、民主之精神作救國治民的良方妙藥。生逢其時的常惺法師，憂心於國家民族之存亡，敏銳地指出科學技術的狂熱追求對人的精神世界的消極影響，民主法制與當時的中國國情亦不能相配，而極力宣揚大乘佛法慈悲濟世，勇猛無畏的真義，提出佛法救國的口號，主張以佛法作為消弭戰爭，安定人心，維護國家統一的理論基礎。

關鍵詞：常惺法師、科學、民主、佛法救國、佛教改革

自 1840 年鴉片戰爭開始，中國開始進入近代社會，這是我國歷史上一個十分特殊的時期。此一歷史時期，中國社會經歷了「數千年未有之變局」，魏源在《明代兵食二政錄敘》裏描述當時的情形：「夷煙蔓於海內，貨幣漏於海外，漕漕以此日弊，官民以此日困」。曾經那個在閉關鎖國政策下得以保全的封建國家的經濟基礎、政治結構、社會風尚在英國的堅船利炮之下以一種疾風驟雨式的方式被完全的打破了。伴隨著封建社會的急劇解體，西方的文化也開始大量湧入中國。這就是 19 世紀中後期以及 20 世紀初期的中國歷史的現狀。

隨著各種西方思想的傳入，中國人不但面臨著民族、國家的生存問題，也面臨著傳統文化的信仰危機，中國的知識份子，在巨大的民族災難和社會變革面前，發起了一場思想的「古今之爭」。作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精華之一的中國佛教，為著自身之傳承發展，為著國家、民族之永續，也開始了一場佛教改革運動。常惺法師正是近代佛教改革中的一位傑出代表。筆者試就常惺法師的佛教救國思想作簡要的介紹和分析。可算作對近代種種救亡圖存思想的一種補缺，同時使讀者明見佛教思想的開放性、包容性，以及佛家慈悲、喜舍、平等、勇猛無畏的精神。

一、常惺法師對時代悲劇的感受

常惺法師在世之時，正當清帝退位，民國初造之時，彼時之中國，雖有中華民國之名而無統一之實，國家正陷於四分五裂、軍閥混戰、民生凋敝的慘境。常惺法師親歷戰爭，深知戰爭對民眾造成的創傷之深。他在《雲南金卍字救護隊成立的經過及出發後工作的情形》一文裏詳細描述了戰爭給民眾和普通士兵造成的傷害，「一入陣地，見斷手折足者，血流披體者，腦漿迸裂者，腹破腸出者；或有腹痛難忍，周回滾爬，哀號求死者；有或帶傷未亡，豺狗即來啖食，慘聲求援者。傷心觸目，不忍卒睹。」¹當時戰爭之慘烈，百姓生若累卵之淒涼，今人讀之尚且同寄於不忍，更何論心懷大慈悲的常惺法師親歷親見，其心之哀慟悲傷，絕勝於今人。

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為求國家民族的解放，對中國傳統文化多持反對、批判的態度，繼而張目西望，以求救國之道。適時各種救國思想並湧，有主張科學救國者，有主張民主救國者，有主張實業救國者……常惺法師得恩師自誠上人厚愛，乃允其就讀於新式學堂——如皋省立師範學校，接受新式教育，後又入華嚴大學深究佛教義理，故而對當時社會之種種救國思想皆有深見，並以大乘佛教思想為基，對各種思潮都進行了一番評述，闡明各種思想的優點和不足，由是大倡佛教救國的主張。

¹ 常惺：《雲南金卍字救護隊成立的經過及出發後工作的情形》，《常惺法師集》，廣陵書社 2010 年第四卷第 69 頁。

1. 科技救國、實業救國的隱憂

當時中國，有提倡科技救國者認為，西方國家歷經了兩次工業革命的洗禮，科技愈加進步，物質愈加豐富，國力愈加強大。所以能雄視世界。反觀中國，科學落後，物質貧乏，國力孱弱，所以為外夷欺凌，喪權辱國而不能自救。因此，他們主張中國應該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大力發展實業，富國強兵，則中國必定能擺脫積弱積貧的現狀，與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並駕齊驅。持此主張者，有中國「睜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則徐，和翻譯《天演論》，宣傳社會達爾文主義，提倡「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嚴複，以及發起洋務運動，大量引進西方技術的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地主官僚們。與此同時，提倡「實業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也適時而生了。在當時的中國社會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辦實業的熱潮，大量中國官派留學生也積極學習西方的工業技術，期望科學技術能改變中國積貧積弱的狀況。各社會階層都主張的科技救國思潮成為近代中國救亡圖存的一大主流。

常惺法師以一位慈善的宗教家的眼光敏銳地察覺到了科學技術給人的精神世界帶來的消極影響。他認為，科學進步，物質文明，確實是世界發展的大潮流。但是物質文明發展過程中對人的思想行為的消極影響卻有被忽視之憂。試為之概說為三點：其一，民眾喪失其信仰，只顧滿足個人的私欲，「一改其豎的生存之要求，而為橫的極量縱欲之發展。」¹其二，造成強大民族對弱小民族的壓迫。「又以物力有限，欲望無窮故，更利用經濟勢力，壓迫其他貧弱民族。」²其三，科技成為帝國主義為惡的「幫兇」。「何一非誤解生存之真義，複利用科學以助成其惡歟。」³科學越昌明，人類物質財富越豐富，而人們對生命無限追求的精神卻逐漸喪失了，人們的精神世界失去了皈依之處，人心之墮落，一發而不可收拾。因為科學雖為時代發展之潮流而實有上述三種隱憂，因此，常惺法師說：「今日欲救中國之危亡，一方固宜提倡科學，庶物質建設方面可與歐美列強並駕齊驅，一方尤宜大倡佛學，俾人人識得本來之實際，確定行為之標準，不至私欲汨濫而無底止，此實為標本兼治之方也。固嘗謂欲救世界，非因果輪回之真理，不足喚起陷匿欲死之人心；非緣起互成之學說不足以止人類殘殺之慘劇。」⁴法師提出以佛教作為人們精神世界的皈依之所，雖失之於偏頗，但能於眾生對科學技術趨之若鶩，大倡大行之際，慧眼洞觀其弊，直陳利害。常惺法師學思精深，不得不令人十分地嘆服。

2. 民主救國的不足

民主救國，憲政救國是近代救國思潮中的另一大主流，康有為的維新派和孫

¹ 常惺：《佛學概論》，《常惺法師集》，廣陵書社 2010 年第一卷第 21 頁。

² 同上。

³ 同上。

⁴ 常惺：《佛學概論》，《常惺法師集》，廣陵書社 2010 年，第一卷第 22 頁。

中山革命派當屬此類。他們主張建立西方式的君主立憲政體或民主共和政體，制定現代法律體系，以法治國，所以力主創建法政學堂，培養法律和政治人才。

常惺法師認為，推行民主法治，平民政治是時代潮流，不可逆轉，他在《佛化建國芻議》中明確說道：「近代潮流所趨，以法治為鵠的，故平民政治為人類共同之要求。此征諸歷史，揆之現世，而無可否認者也。」¹但是，常惺法師認為，國家平治的核心是安定人心。在當時的中國只推行法治，還不足以安定社會，維護國家主權。因為中國國情、民情複雜。他說：「中國受兩千餘年之專制，民智蔽塞，地方數萬裏，習尚、信仰互異，今日驟行法治而置人治、禮治於不顧，此事之扞隔難通也。」²這裏常惺法師所說「禮治」、「人治」的涵義與我們通常所說的作為封建禮教的「禮治」和君主專制的「人治」涵義不盡相同。筆者認為法師所說的「禮治」，主要指對民眾進行道德教化，防止民眾陷溺於私欲和物欲，以至精神世界變得荒蕪。他將中國的儒術和西方的宗教看做是中西方「禮治」的內容可以作為筆者這一分析的明證。其次，常惺法師所講的「人治」是指為了使法律不成為一紙空文需要擁有強權的人或者組織來保障法律的實行。而且國家處於分裂、動盪的狀態，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沒有強勢的「中心勢力」。所以法師認為，欲求國家之安定應該主以「法治」而「禮治」、「人治」輔之。

而能將「法治」、「禮治」、「人治」三者冶於一爐的中國本土文化只有大乘佛教。他說：「竊佛教之精神，在化小我為大我，故有慈悲、喜舍、勇猛無畏之精神，足以養成救世之英雄。其對一般國民，以因果輪回之說維繫其心，雖有宗教之作用，而無宗教之迷信。至於人人皆可作佛、自他平等緣起互成之說，尤足顯民治真平等、真自由之精神。」³並且，佛教文化在中國已有千餘年的歷史，對中國人的思想行為已經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尤其是蒙古和西藏地區，民眾普遍具有佛教的信仰，對蒙古、西藏的管治更加不可忽視佛教的因素。所以常惺法師說：「若徒誤於一時潮流之所趨，而忽夫立國之要素，匪特內部擾亂無已，而蒙藏邊蕃恐亦將不為我有矣。故崇尚佛法救國之真義，為建國安民之大本。」⁴

二、常惺法師論佛法何以能救國

常惺法師認為，科學和民主是世界發展之潮流，我中國不可不順應潮流，但是科學和民主都有其弊端，也不可不察，與中國國情相契合，能從傳統的文化中

¹ 常惺：《佛化建國芻議》，《常惺法師集》，廣陵書社 2010 年，第四卷第 65 頁。

² 同上。

³ 常惺：《佛化建國芻議》，《常惺法師集》，廣陵書社 2010 年，第四卷第 65 頁。

⁴ 常惺：《佛化建國芻議》，《常惺法師集》，廣陵書社 2010 年，第四卷第 66 頁。

為災難深重的中國的救亡圖存尋找到出路的只有大乘佛教。就佛法救國何以可能？這一問題，常惺法師做了多方面的論述。

1.佛法中的救世思想。

常惺法師認為，大乘佛教中的救世思想主要有三點：一是因果輪回說。常惺法師認為，人的生存有兩個方面，一是滿足自身生存的物質欲望，二是對自身精神無限性的追求。因果論說雖然不能被科學所證明，但是賴耶受熏持種，三世輪回說，對解決人們精神上對生的無限追求有積極的意義，緩解了有限生命的人面對無限的宇宙時的無力感和孤獨感。提高了人的現實生活的積極性。二是法界緣起說。法界緣起說的意義是使人明瞭，萬事萬物的變化發展是有關聯的，一方的變化發展必然引起其他方的變化發展。常惺法師用佛教法界緣起說，批駁當時流行的生存競爭說。呼籲世界互助互存，摒棄殺戮、戰爭。他在《僧界救亡的一個新建議》裏說：「緣起互關，理所固然。意者學佛昌明，其為茲後人類和平之曙光歟。」¹三是平等自在說。世界大同，人人平等是當時所有主義和思想共同的理想追求，但是，他們之間又互相攻訐，是己非人，互成敵對，以致紛爭不斷，事實上與自身的主張和願景越來越遠了。佛教的平等自在說，認為人的本性是自在平等的，人的追求是一致的，人人都依佛家化小我為大我的精神，人人明證平等自在的本性，則每種主張、每種主義都能不囿於成見，同心戮力，那麼大同世界必將實現。常惺法師認為佛教中有此三種思想，足可作為佛法救國的思想基礎。

2.佛教救國的現實可能性

常惺法師認為，佛教救國不但有思想的指導也有現實的基礎。佛教自東漢傳入，在中國已曆千餘年之久，對中國世道人心乃至思想文化的影響非常深遠，中國人的思想軀體中潛藏著佛教文化的基因。佛教對基層民眾的思想構成的影響是巨大的。宣導佛法救國能夠得到民眾的情感認同。其次，正如常惺法師在《佛化建國芻議》中提到的，中國地域遼闊，邊疆地區特別是蒙古和西藏地區的人民受佛教的影響更深，倡行佛法救國，有利於維護邊陲的穩定，維護國家的統一。再次，當時中國的主要問題一是列強侵略的外患，二是軍閥混戰的內憂，提倡佛法救國，推行佛化建國，有利於消弭國內紛爭，實現國家的安定團結。常惺法師在《雲南金卍字救護隊成立的經過及出發後工作的情形》最後的述者感言中說道：「竊以近今各方戰事之起源，其情形雖甚複雜，往往為正義，為人格而戰，有苦於不能自己者。但最大之原因，多半私我為之厲階。而佛法所針對者，正為貪、嗔、癡、毒所滋養之私我。我佛徒若不能積極宣揚佛陀無我之大化，使戰爭消滅於無形，而但消極的施救於有形之創痛，雖雲本我佛之宏慈，而實非我佛之真慈

¹ 常惺：《僧界救亡的一個新建議》，《常惺法師集》，廣陵書社 2010 年，第四卷第 56 頁。

也。當此強權伸張，公理沉沒之時，固知不可空言慈悲，徒手弭兵。但世界事業為人類共同心理之所表現，吾人果能盡力宣揚佛化，使多數人覺悟，深信無我慈悲之至教，則戰事自可逐漸減少，最後乃至於無爭，而同享和平之幸福。」¹

三、佛法救國的先聲——佛教改革

常惺法師認為，佛法是標本兼治的救世之方，國家應該大力推行佛教，提倡佛學，方能為國家的和平帶來曙光。但當時的民國政府發起「廟產興學運動」，要求各地將廟產沒收，作為辦教育興學的經濟來源。這場運動促使國民政府與僧界的對立，佛教不但不能擔負起救國安民的責任，其自身的合法存在也受到了挑戰。並且當時的佛教自身也面臨著腐化不振、人才不濟、遠離世事，消極避世等問題。常惺法師為了維護僧眾的利益，一面積極奔走，呼籲政府取消廟產興學，一面撰文、演說，進言佛教界應該適應大勢，整頓僧團、改革佛教。

1. 佛教的現狀

常惺法師對當時的佛教界腐化不振，消極墮世的狀況深表擔憂，他總結了六點造成佛教腐化不振的原因。其一，濫剃度而不教養；其二，弛戒法而廣獅蟲；其三，重形式而缺精神；其四，背注述而無方法；其五，封故步而昧大勢；其六，念彌陀而待死亡。認為有這六種原因同時作用又造就了山林派、長老派、雲水派、子孫派、方丈派、法師派、應付派等七種消極墮世的僧人。因而，常惺法師直言不諱地指出：「我們若不趕快醒悟過來，自動地整理淘汰，務求佛法有利於現實的社會，僧眾實在沒有存在的可能了。」²

2. 佛教改革的三個方面

常惺法師認為，中國的佛教改革應當是從三個方面進行改革。第一點是加強佛教教理的灌輸，或稱之為佛教精神的復活。這一方面，常惺法師持批判的態度，他認為，舊的佛教教育特別是禪宗和淨土宗為了「潛伏」到民間去，過分地強調不立文字的「念死佛」，對佛教的現代發展是極不利的。他說：「從前念佛、參禪是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現在研究教理，不獨要知其然，並要知其所以然。知其然的念佛、參禪的行動，很需要知其所以然的研究教理來補充，才可以獲得真正的果實。」³所以常惺法師積極推廣建立現代佛學院和僧學校，希望重建佛教僧眾對教理的研究，更好地向世間弘法。

¹ 常惺：《雲南金卍字救護隊成立的經過及出發後工作的情形》，《常惺法師集》，廣陵書社 2010 年，第四卷第 70 頁。

² 常惺：《僧界救亡的一個新建議》，《常惺法師集》，廣陵書社 2010 年第四卷第 59 頁。

³ 常惺：《現代中國佛教》，《常惺法師集》，廣陵書社 2010 年第五卷第 25 頁。

第二點是重整佛教戒律。常惺法師認為，明清以來，佛教傾頹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戒律廢弛。他認為，佛教徒的生活與世俗人的生活是不一樣的，應該有自己的規範和「綱紀」。戒律就是佛教徒的「法律」，重整戒律，使「僧伽生活律儀化」，不但與原始佛教組織的精神相契合，也與崇尚法治和制度建設的現代精神相吻合。當然常惺法師也明確指出佛教的戒律與世俗的法律是不同的，戒律是佛家特有的「家風」。

第三點是體現佛教的現代作用。常惺法師認為，佛教對社會的影響有消極的和積極的兩方面。封建時代，統治者為了消磨有識之士的政治參與熱情，抬高佛教地位，用小乘佛教中的「消極」思想限制人的政治思想和現實行動。是一種無用之用。常惺法師認為，這是封建帝王以神道設教維護其統治的政治手段，不是佛法的真義。他說：「我深信大乘佛教的思想，是應該參加社會積極救世、救一切眾生，創造一個新人生出來！這是大乘佛教積極的有用之用。」¹所以他認為，現代的佛教徒應該砥礪弘揚大乘佛法，積極入世，做濟世救民的工作。這不但是佛陀弘法的真諦，也是佛教立足現代社會的一個必要的轉變。

3. 佛教改革的方案

常惺法師認為佛教的社會立足點有三，一是其不滅的真理，二是有實證的大德，三是得群眾的信仰。三點之中，第一點是佛法本身的價值意義，第二點和第三點有待佛教徒的努力實現。尤其第二點最為常惺法師所重視。他說：「我們此後要實際證明甲點（即其不滅的真理）的價值不謬，繼續保存丙點（即得群眾的信仰）的結果不失。那麼，就全關乎有沒有實證的大德了。」常惺法師認為，當時的佛教界除幾位長老大德，大多數的僧人都不能稱得上住持佛法的人。針對當時佛教界派別林立，腐化不振的狀況，常惺法師提議成立一個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作為佛教改革的機構，統一負責佛教的改革事業。他從成立機構、確立人選、擬定綱領、進行步驟等多個方面對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這一設想進行了十分細緻的規劃。對可能帶來的辯難、批評，也分條縷析地進行了回應。

四、結語

20世紀初的中國內憂不斷，外患不絕，社會動盪，民生凋敝。值此社會變革之際，佛教界也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常惺法師實現了一個僧人的公共意識的覺醒。他憂心佛教的存續，主張順應時代發展的大形勢，進行佛教改革，建立現代佛學院，培養僧才，積極實現佛教的社會化。用盡心力宣揚大乘佛教積極救世和互助

¹ 常惺：《現代中國佛教》，《常惺法師集》，廣陵書社 2010 年第五卷第 23 頁。

共生的思想。他擔心國家前途，主張佛教救國，期望以佛法淨化世人逐利之心，以佛法凝聚普通百姓，以佛法促進民族團結。常惺法師目光敏銳，思維深邃，對世道和人心的把握極其準確。他看到了適者生存的社會進化論的弊端，也看到了宗教在凝聚底層民眾和少數民族人心方面的巨大作用。常惺法師認為佛教改革的關鍵在培養僧才，所以他一生致力於創建佛學院和培養僧才。先後參與創建了安徽僧學校、閩南佛學院、泰州光孝佛學社等僧學校，為現代佛教教育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參考文獻

常惺著《常惺法師集》，揚州：廣陵書社 2010 年。

慧雲編著《常惺法師年譜》，揚州：廣陵書社 2010 年。

范觀瀾編《華嚴文匯》（上下），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年 8 月第一版。